

战胜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使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这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当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民自卫武装（民兵）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在平原，则展开地道战和破袭战。华北平原地区军民首先在道路上挖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敌后军民建成户户相通甚至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网，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成各式各样的地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庭院落，使日、伪军进村入户就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敌后军民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碉堡下，常常把出发的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水网地带进行。当

地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自己的小木船则出没自如，寻找机会打击日、伪军。

武工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是根据地军民为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而创造的新的斗争方式。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母不忍群众被打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威胁利诱她写信劝儿子投降，她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9月25日，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

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中共中央还采取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 $1/3$ ）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

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调动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减息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情，根据地青年踊跃参军。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

在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的过程中，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

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开展劳动竞赛，连排班之间，个人之间互相挑战，涌现出了许多“气死牛”式的模范人物。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如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选举办法。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抗日根据地重视法制建设。各根据地在创立发展过程中，依据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结合抗日

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继制定、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和条例的制定颁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初具规模。同时，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训了大批干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43年初，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推广陕甘宁边区开展“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即“双拥”）运动的成功做法，倡导推动这一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形成军政军民团结齐心、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生动局面。

抗日根据地还努力探索社会建设之路。如晋察冀边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救灾治水，救济灾民；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疾病流行；保护妇女的社会权益，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制定社会保险政策；拥军优属，抚恤烈士遗属和因公致伤、致残人员；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治廉洁的社会。通过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使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这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对以后建设新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案例：为什么数万青年奔赴延安

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青年是一道独特风景线。诗人何其芳描述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许多追求进步、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吸引来了。据任弼时 1943 年 12 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 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占了 71%，初中约为 30%。这些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大都家境殷实，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门公子”，在当时可以预期美好的“个人前程”。还有一部分人更为特殊，是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青年。

奔赴延安的路漫长而艰辛，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梁漱溟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作为社会贤达，梁漱溟进入延安尚且如此艰辛。对于知识青年而言，每一步都是惊险，每一步都是一次人生的考验。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一位青年的答案

是，在南京，“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革命圣地延安的主要开创者、党的领袖毛泽东的答案是什么呢？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作出了回答。答案是延安有“十个没有”：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没有官僚作风，没有不良风气，没有萎靡不振；有理想，有信仰，有民族的希望，这是延安让人舍生忘死奔赴的原因，也是不同时代人们的不懈追求。

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从卢沟桥事

变起一直表示坚持抗战。但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过某些谋求妥协的活动。他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甚至由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以重兵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40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新军对以上进攻都给予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在压住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萧劲光、王若飞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国内政治情况，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共产党的任务仍应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向黄桥新四军无理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10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1.1万人。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

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系列反共行动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面对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黄炎培、冯玉祥等分别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当局。全国数百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仍然采取避战观战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要消灭共产党。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熊向晖（中共秘密党员）及时将国民党的反共部署与动向报告了中共中央。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一方面公开发表文电，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同时组织延安三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

止。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有效地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而且继续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更多的人也由此看清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利益。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